

· 史实考证 ·

指导台湾共产党创建者详考

梁 化 奎

1928 年 4 月 15 日，台湾共产党在上海法租界宣告成立。彭荣代表中共中央出席并领导了这次大会。这是中共党史上的一件大事，然而关于彭荣是谁的问题，至今仍是“中共党史上的一桩谜案”。关于这个问题，在 2010 年之前，学术界主要有三种观点，即彭荣是彭湃说，彭荣是瞿秋白说，悬疑说。^①

2010 年 6 月，台北“中央研究院”台湾史研究所出版了两位俄罗斯中国学专家郭杰（К. М. Тертицкий）和白安娜（А. Э. Белокурова）合著的《台湾共产主义运动与共产国际（1924—1932）研究·档案》（以下简称《研究·档案》）一书的中文版。书中对于彭荣是谁这个一直未能解开的谜团，在第三章“补充说明”部分提供了一种新说法，即彭荣是任弼时说。文中说：“有根据认为，中共代表任弼时监督了台共代表大会的召开。”为此，著者引证了林木顺（台共创始人之一）1928 年 11 月致共产国际的报告，这一新解密的俄档文献中的史料。报告中说：“在成立大会席上除了台湾代表以外，还有中共中央派了任△△同志领导我们的大会。”又言：“台共第一次代表大会之后发生了逮捕事件，在这样的局势下，他同任弼时、佐野学商讨了自己的下一步行动。”^②为证实此说，郭、白在第三章“补充说明”的第 49 条，还进一步引证了一些中文资料，就此作了简要考述。^③

受上述新说的启发，通过对相关历史资料的再读，笔者认为，彭荣是任弼时说，或者讲，任弼时指导了台共创建，确有史实基础上的可信性。这样说，不仅是因为有俄档解密文献第

一手资料的佐证，关键还在于认定彭荣是任弼时，更合乎史实与逻辑的一致。

台共的创建是 20 世纪 20 年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发展的产物。由于台湾当时是日本的殖民地，按照共产国际“一国一党”的原则，共产国际“决定由日本共产党中央负责领导筹建台湾无产阶级政党的工作”^④。然而日共中央先是因要准备国会选举斗争，后又因国内发生了当局针对日共和其他左翼组织成员大逮捕的三一五事件，故而向中共提出请求，希望中共中央能够“援助及指导”台共创建工作。中共中央遂指派彭荣负责这项工作。1928 年 4 月 13 日，彭荣及台湾共产主义者积极分子林木顺、谢雪红等召开了台共建党筹备会议，接着于 15 日便召开了台共成立大会。这就是台共建党的基本经过。

根据相关资料记载，彭荣作为中共中央的指派代表，其在台共创建中的指导作用，主要体现在：一是提议召开并出席台共建党筹备会

① 有关这三种说法，参见张春英、蒋宗伟的文章《“彭荣”是谁仍待探究》，《党的文献》2010 年第 4 期。

② （俄罗斯）郭杰、白安娜著，李随安、陈进盛译：《台湾共产主义运动与共产国际（1924—1932）研究·档案》，（台北“中央研究院”台湾史研究所，2010 年，第 69 页。关于林木顺致共产国际的报告，郭、白在书中多次引用，但却未提供全文。据二人对这一文献所做的标注，其俄档文献编号是：俄档 // 全宗 514 / 目录 1 / 案卷 461。

③ 参见《台湾共产主义运动与共产国际（1924—1932）研究·档案》，第 69—70 页。

④ 杨克煌《台湾人民民族解放斗争小史》，湖北人民出版社，1956 年，第 130 页。

议和成立大会；二是指导对台共政治和组织大纲进行评议与修改，同时指导起草了劳动运动、农民运动、青年运动等决议草案；三是为台共成立大会亲自选定了会址，并在会上发表了“训示性演讲”等。

在理清了台共创建的基本脉络与彭荣在其间的活动身影和作用之后，再来看彭荣是谁的问题，可以从台共成立后彭荣与日共领导人佐野学、台共领导人林木顺的一次会晤入手，来做进一步考察。关于这次会晤，林木顺在致共产国际的报告中，不仅指出了会见发生在台共成立后的逮捕事件，即4月25日日本警方在上海逮捕了台共领导人谢雪红及其他几个党员之后，而且直接点明了是他同任弼时、佐野学共同商讨新形势下台共的“下一步行动”^①。郭杰和白安娜在《研究·档案》一书中，征引简炯仁在《台湾共产主义运动史》（前卫出版社1997年版）一书中的资料，更是明确提出：“1928年5月，佐野学和彭荣在上海会面。会见中，彭荣对他谈了建立台湾共产党的事情。”^②另外，卢修一在《日据时代台湾共产党史（1928—1932）》一书中，依据“佐野学第八次预审供述”^③提出“台共成立后，佐野学在上海遇见一位中共中央委员。这位中央委员与几位台湾人早在一九二八年二月或三月间，即对台湾共党团体的组织问题有过数次讨论。”^④而据日本森正藏的研究，“佐野学在三·一五事件前，逃出东京，三月十三日到了上海……图谋恢复已被破坏的党的机关。正值是年五月发生了济南事变，在事变前，他到莫斯科出席共产国际的第六次大会”^⑤。

从上述几则史料看，第一，三一五事件后，由于日共指导台共建党工作的不可能，也因佐野学的再次请求，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远东局沟通后，始而指派彭荣负责这项工作。这就是说，至少在1928年3月中旬彭荣就已开始指导台共创建工作了。而这时，彭湃正在海陆丰一带领导暴动工作。如3月12日和22日，彭湃率领红4师和地方武装两次攻下惠来县城；4月8日，又率军撤出惠来县城并决定到潮阳、普宁、惠宁一带去开辟革命根据地；4月中旬，彭湃在大南山的林彭乡召开了潮、普、惠三县

干部会议，商讨建设大南山革命根据地问题；会后又深入到华湖、和田等乡村开展宣传活动。^⑥而就彭荣在台共成立前后的表现看，客观地讲，这些言行背后所需的前提和素质条件，实不是长期在地方从事农民运动、大革命失败后又在乡村组织农军暴动的彭湃所能兼及具备的。

彭荣是彭湃说，以谢雪红的自述最具代表性。^⑦不过，对于谢雪红回忆录的真实可靠性，郭杰和白安娜在《研究·档案》中已提出质疑。认为谢的回忆既“充满了独一无二的‘第一手资料’”，又“吞吞吐吐、随口杜撰”，“不止一处有意损害她的政治对手的声誉”^⑧。

第二，台共成立后，彭荣与佐野学、林木顺确有过一次会晤，时间应在4月25日日本警方逮捕台共领导人谢雪红之后至5月初这段时间。资料显示，瞿秋白4月30日即离沪赴莫斯科，参加中共六大。^⑨所以，瞿、佐之间不可能有4月底5月初的这样一次会见。进一步说，从1928年2月至4月底，当时中共面临的险峻形势，临时中央政治局亟待解决的紧迫任务，都使瞿秋白不能不集中精力专注于处理中共党内的要务，而不可能有更多时间和精力再去指导台共建党工作。这也是临时中央政治局指派任弼时担负这一任务的一个重要原因。从

- ① 《台湾共产主义运动与共产国际（1924—1932）研究·档案》，第69页。
- ② 《台湾共产主义运动与共产国际（1924—1932）研究·档案》，第70页。
- ③ 此件是佐野学1929年在上海被捕后，在审讯中对有关台共问题的答复。文档见山边健太郎编《现代史资料》第20辑：社会主义运动Ⅲ，みすず书房，1968年。
- ④ 卢修一：《日据时代台湾共产党史（1928—1932）》，前卫出版社，1989年，第155—156页。
- ⑤ （日本）森正藏著、赵南柔等译《日本社会运动斗争史（前篇）》，中国建设印务股份有限公司，1949年，第89页。
- ⑥ 参见华南农学院马列教研室、广东海丰县红宫纪念馆编《彭湃传》，北京出版社，1984年，第170—172页。
- ⑦ 参见谢雪红口述、杨克煌笔录《我的半生记》，台北杨翠华整理出版，1997年，第253页。
- ⑧ 《台湾共产主义运动与共产国际（1924—1932）研究·档案》，第34页。
- ⑨ 参见刘小中、丁言模编《瞿秋白年谱详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第271页。

瞿秋白在台共成立前后的历史活动看，此间他主持或参与的重要工作主要包括：化解临时中央政治局同李立三主持的广东省委之间对于广州起义认识上的纠纷；频繁地召集召开临时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起草多份中共中央通告，为党的机关刊物《布尔什维克》撰写时论文章；调整改任广东、江苏、浙江省委领导人，给地方省委写指示信；给共产国际撰写汇报材料，讨论参加莫斯科赤色职工大会的组成人选和代表团，讨论贯彻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九次会议通过的《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案》；等等。更重要的是，3月底，临时中共中央政治局接到共产国际来电，确定中共六大在莫斯科召开以后，作为临时中共中央政治局总负责人的瞿秋白不得不把全部精力和工作重心放在中共六大的组织筹备上。包括：讨论决定参会名额及在党内的分配，党内留守中央的组织安排，起草撰写中共六大的政治报告等。全面总结了中国大革命中的诸多政治问题、8万多字的中共六大政治报告，即写于3月底至4月12日这段日子。^①

彭荣是瞿秋白说的另一疑点，是台共组党中的三个关键人物即林木顺、谢雪红和翁泽生，三人都曾是瞿秋白在上海大学的学生，而且台共成立前后，三人与彭荣有过多次重要的接触，应该留下深刻印象。可是，三人在当时及谢雪红在后来的回忆录中，均未说到彭荣是瞿秋白。尤其被认为是瞿秋白“最得意的门生”^②的翁泽生，从郭、白在《研究·档案》书后提供的67份俄档解密文件看，其中有43份是翁泽生当时写给共产国际远东局的信件。在这些集中写于1930年前后的信件中，翁为说明当时台共党内存在的问题，多次提及台共创建时的历史，然而却只字未提或是透露出当年的中共代表彭荣就是瞿秋白。另据史料记载，台共成立时，“大会参加者纷纷向彭荣请教有关战术的诸问题”^③。可是在1930年10月，瞿秋白却向翁泽生等人说到“我们可以说，台湾还未建立一个真正的政党。”现在，“有必要召开一次紧急会议，来检讨第一次代表会议（即创党大会）所决议的党纲领与战术，并建立新的布尔什维克纲领与战术。”^④由此看，若彭荣是瞿秋白，则意味着瞿这时完全否定了自己在两年前的指导

台共创建时所持的观点主张。这同瞿的政治风格明显不符。

三

如前所述，认定彭荣是任弼时更合乎史实与逻辑的一致。就是说，依照此说，借助相关资料，我们即可以把任弼时在这一事件中的历史活动，串连成一个整体。而认定彭荣是彭湃或是瞿秋白，则显然并不能在事实上将其完整地串连在一起。

首先，从任弼时当时在党内的任职变动看，2月29日和3月5日，临时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曾两次讨论任弼时在党内的的工作问题，瞿秋白倾向于“任弼时到中央机关工作”；3月15日，周恩来在临时中共中央政治局会上提出，“弼时一定要到中央来”，会议还决定，为维持中共六大召开期间中央机关的日常工作，任不出席六大。随之，任被调到中共中央机关工作。^⑤4月2日，任弼时在临时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传达了共产国际关于召开中共六大的决定，会议同时还决定，由李维汉、任弼时、邓小平留守国内，组成留守中央。^⑥值得注意的是，任弼时调中央机关工作的时候，恰是日共领导人佐野学在三一五事件后，请求中共援助及指导台共创建之时。同时，也正是林木顺、谢雪红等人正在紧锣密鼓地协商起草劳动运动、农民问题、青年运动等提纲议案的时候。可以说，也就是在这个时候，任弼时受中共中央或是瞿秋白的委托，开始接手指导台共创建工作。这同佐野学在其“预审供述”中的说法，即早

① 关于这份报告的写作时间，从瞿秋白完成该报告后所写的“小引”，可以得到判明。参见《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5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41页。

② 蔡孝乾《台湾人的长征纪录：江西苏区·红军西窜回忆》，海峡学术出版社，2002年，第125页。

③ 警察沿革志出版委员会编、王乃信等译《台湾社会运动史（1913年—1936年）》第3册：共产主义运动，海峡学术出版社，2006年，第12页。

④ 《台湾共产主义运动与共产国际（1924—1932）研究·档案》，第394页。

⑤ 参见章学新编《任弼时年谱（1904—1950）》，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92—93页。

⑥ 《瞿秋白年谱详编》，第269页。

在1928年二三月间，这位中央委员与几位台湾人“对台湾共党团体的组织问题有过数次讨论”，时间上恰好相吻合。

其次，任弼时的身份特征、革命经历，与其在台共成立前后在一些问题上的观点主张，同彭荣在指导台共创建中的表现十分契合。就彭荣在台共创建中的表现看，显然，并不是中共党内任何一位中央委员都可以是彭荣。彭荣的表现表明，此人应相当熟悉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宏观环境及动向，共产国际的政策纲领及政治运作方式，与共产国际远东局以及台湾共产主义者积极分子又都有一定联系。不仅如此，此人还应相当熟悉中共历史的沿革及党内高层的各种政治意见和政治倾向，熟悉在白色恐怖下的上海如何秘密开展党的组织活动，而对于如何组织开展青年运动尤有见长。否则，便不能很好指导台湾共产主义者积极分子起草劳动运动、农民运动、青年运动等决议提纲草案，在台共成立大会上演说中共历史的沿革、批判党内的机会主义错误、组织对台共的政治大纲和组织大纲进行评议与修改，更谈不上为台共成立大会亲自选定会址。

从任弼时的革命经历看，1924年8月他从莫斯科回到上海后，曾在上海大学担任俄文教授。台共成立时被选为中央委员的蔡孝乾回忆当年他被调往苏区的情形时说，他在上海大学读书时，曾经选修过任弼时的俄文课，所以二人之间“算是师生关系”。又说任“知道”他是台共领导人之一，他被调苏区“无疑是与任弼时有关”。蔡还特别提到，“一九二八年春台共在上海举行成立大会时，任弼时担任共产国际东方部的联络工作。”^①事实也是如此。1925年1月，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改称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以后，遵照组织安排，任弼时的工作中心逐渐从上海大学转到团中央，并于同年7月任团中央总书记兼任组织部主任。^②1926年6月共产国际远东局落脚上海后，任弼时（化名布林斯基）与共产国际远东局负责青年运动问题的H·A·福京（化名季米烈夫），“保持着密切的联系”^③。这也打下了任弼时在指导台共创建过程中能够与共产国际远东局及日共之间保持顺畅联系的基础。

在指导开展青年运动方面，任弼时在大革命中就提出，注意“于农村中”发展团组织，“尤为重要”^④。不久，他又提出使团的工作“青年化”、“群众化”的口号。^⑤而中共代表彭荣在指导台共讨论“青年运动提纲”时，也持有类似的观点主张。1931年初，翁泽生在写给共产国际远东局《关于青年运动的报告》中，不无抱怨地说“在1928年的台湾共产党成立会议上，与会同志们讨论到青年运动及如何对待‘无产青年会’的问题。原先的决定是要成立共产青年团（C·Y），而让无产青年会继续存在……但是中国共产党代表后来在创党会议中反对这种决定，并指出共青团是个群众组织，‘无产青年会’不应该与共青团同时并存。结果会议最后做出的决定是：组织共青团，而让‘无产青年会’消失。”翁接着又说“创党会议也同时决议要在工会与农民组合设立青年部，希望吸取青年工人与农民参与斗争活动。”^⑥再如，翁在同年2月致共产国际远东局的信中说：台共创党大会时，“我们的同志当时不愿成立革命的台湾总工会来与黄色工会战斗。他们想经由组织统一战线的和平方法，来达成此一目的地。当时的远东局曾透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就此事提醒台湾[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可是台湾[共产]党在机会主义领导下，根本没有落实此一正确路线。”^⑦从任弼时在台共成立后不久写给江西省委的信中可以看出，在对待“黄色工会”的问题上，任的主张与彭荣的态度是

① 《台湾人的长征纪录：江西苏区·红军西窜回忆》，第18页。

② 参见《任弼时年谱（1904—1950）》，第43页。从这点看，谢雪红1925年9月进入上海大学，年底即去了莫斯科东方大学。由于这个原因，谢雪红和任弼时可能根本就没有见过面。这也是后来谢在认定彭荣是谁的问题上之所以出错的原因。

③ 参见《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3卷，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第354页。

④ 参见《任弼时选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5—17页。

⑤ 参见《任弼时选集》，第19页。

⑥ 《台湾共产主义运动与共产国际（1924—1932）研究·档案》，第441—442页。

⑦ 《台湾共产主义运动与共产国际（1924—1932）研究·档案》，第408页。

相一致的。任弼时认为，“不管是有群众的黄色工会或无群众的黄色工会，一概笼统地机械地提出打倒的口号”，经验教训告诉我们，“这种政策是错误的”^①。另外，从任弼时在1928年5月初为中共六大准备的团中央报告中对“党的政策与反机会主义的经过”的叙述，以及他在5月18日为留守中央起草的《白色恐怖下党组织的整顿和秘密工作》的通告，也可以看出其与彭荣在台共创建时的言行表现是相契合的。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关于任弼时的化名或笔名，一些文史资料版本仅提到他曾经使用过“辟世”、“辟时”、“辟适”、“PS”、“史林”、“布林斯基”、“胡少甫”等，却漏掉了他还曾使用过“彭德生”这个化名。1929年11月17日，也就是台共成立一年多后，当时任江苏省委常委、宣传部长的任弼时在上海被捕。据当

年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的档案资料，在一份印有任弼时十指指纹、用中英文书写的判决书上，姓名一栏填写的是“彭德生”。^②《淮南子·本经训》认为，“蠓飞蠕动，莫不仰德而生”；“春肃秋荣，冬雷夏霜，皆贼气之所生”。从旧时文人起名称字的习惯看，任弼时、彭荣、彭德生这三个姓名之间，是有内在联系的。

综上详考，可以认定任弼时就是彭荣。就是说，任弼时指导了台共的创建。

(本文作者 徐州工程学院思想政治理论课教研部教授 徐州 221008)

(责任编辑 薛承)

① 《任弼时选集》，第54页。

② 参见章学新《任弼时传》，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201—202页。

(上接第119页)是独家的。”^①

金大陆还曾经写了一部《非常与正常：上海“文革”时期的社会生活》。董先生在他文章中提到的研究内蒙古“文化大革命”史的吴迪，就对金大陆的研究方向和成果非常感兴趣。《记忆》编辑部按语说“文革研究一向集中在政治史上，而在档案没有公开的情况下，研究政治史寸步难行。金大陆从社会文化的角度切入，扩展了文革研究的新领域，他撰写的《非常与正常：上海文革时期的社会生活》一书就是这一研究的硕果。它不但具有方法论的意义，而且为我们提供了文革研究的新思路。”^②

显然，从社会史和地方史视角切入研究“文化大革命”史，有利或便利条件确实很多，意义也很大。其研究及成果也需要社会予以足够的重视。在这篇文章中，董先生也正是这样告诉我们的。他说“从社会史、地方史视角切入的相关研究，大大拓宽了我们的学术研究视野，带有史学观念革命的性质，值得大力肯定。”我想，各地、各部门、各系统的“文化大革命”史都搞起来，都搞好，如果北京的、上海的、天津的、重庆的、中宣部的、文化部的、农业部的、清华大学的、北京大学的“文化大革命”史，都能搞好的话。在这样的基础上，搞出来的整个“文化大革命”史能不更丰富、

更有血有肉吗？当然，各地、各部门、各个系统的“文化大革命”史要想搞好的话，也有赖于整个“文化大革命”史在中央档案完全开放的基础上搞出更好的版本。二者相互依赖，相得益彰，合则双利，离则两伤。

不论做好宏观的“文化大革命”史研究，还是做好微观的“文化大革命”史研究，其最根本的关键和要求就是实事求是和说真话。这除了研究者本人所需要的种种条件外，还需要一个能说真话的社会舆论环境。马克思说“说真话”是“人人应尽的义务”^③。无疑，研究者们应认真而切实地贯彻执行马克思的这个教导，使之真正成为每个人的座右铭。

让我们共同努力，推动“文化大革命”史的两项研究，使其比翼双飞！

(本文作者 求是杂志社老干办 北京 100727)

(责任编辑 王志刚)

① 参见启之《关于“文革”研究的新思路——金大陆教授访谈录》，《记忆》2012年第79期。

② 参见关于《金大陆教授访谈录》的编者按，《记忆》2012年第79期。

③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第138页。